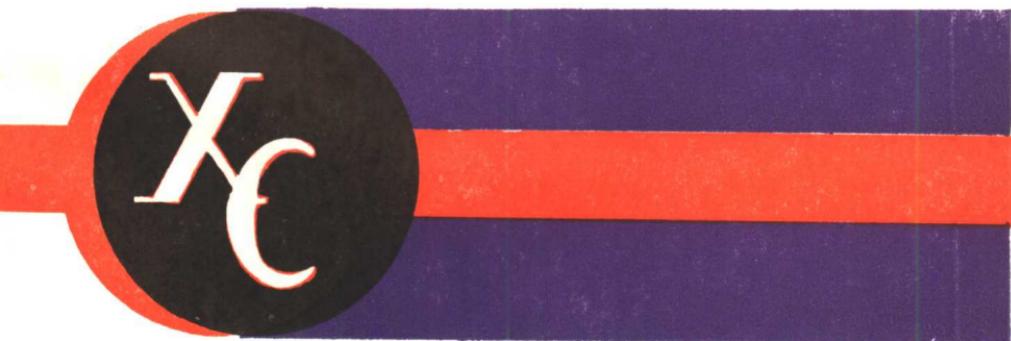


● 中国修辞学会编

修辞的理论 与实践



语 文 出 版 社

XIUCI DE LILUN YU SHIJIAN

修辞的理论与实践

主编 张寿康 黄宏煦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主编 张寿康 黄宏煦
编委 倪宝元 郑远汉 张国庆
黄岳洲 时煜华

XIUCI DE LILUN YU SHIJIAN
修辞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修辞学会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0.25印张 235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3.80元
ISBN 7-80006-176-0/H·51

序 言

1985年8月中国修辞学会在大连召开了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我们接受会议的委托编选了这本《修辞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修辞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组织了不少次学术交流活动。1981年在广州召开了年会，1982年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纪念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编辑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后又曾在昆明、西安、石家庄召开过学术讨论会，先后编辑出版了《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到第四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辞和修辞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拟定了《高等院校文科修辞学教学大纲》（修订稿），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起了组织推动的作用。

近些年来，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在下列各方面都有了进展：一、引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汉语修辞学；二、修辞学与有关学科的边缘研究；三、语体学和风格学以及作家作品语言表达艺术；四、修饰之学；五、词语、句式和话语篇章研究；六、修辞学史的研究；七、新辞格的建立；八、修辞的实践与教学。《修辞理论与实践》一书在以上几方面均有所反映。兄弟民族语言的修辞在修辞学中是薄弱环节，本书选入了一篇《维吾尔族谚语的民族特色》，目的在于引出更多的玉来。

中国修辞学的研究，近些年来主要是靠学术团体的推动来发展的。希望今后修辞学的研究和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多作贡献。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黄岳洲同志为责任编辑，出力尤多。稿件大多经作者几次修改，历时近两年才编定了这本书。

张寿康

1987年9月

目 录

序言.....	张寿康 (1)
短论二题	
一、谈谈文章学	
二、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吕叔湘 (1)
张志公和现代汉语修辞学	黄成稳 (5)
言语的美	郑远汉 (18)
修辞手段功能的基本类型和功能发生	童山东 (29)
语体研究与修辞学的现代化	
论广播语体的形成及其特点	时煜华 (51)
法律语体语言的表现风格	袁晖 陈炯 (60)
法庭辩论与修辞术	王 洁 (73)
简论文摘语体及其写作	吴慧颖 (79)
口语语体词汇的修辞特色	常敬宇 (93)
推销员的口语修辞	杨绍长 (103)
现代汉语中文言句式的修辞作用	冯 凭 (110)
说委婉	
试谈斟酌词语	倪宝元 (115) 尹世超 (127)

词语的理解和误解	石云孙	(134)
色彩描写词语的修辞特色	马挺生	(144)
维吾尔族谚语的民族特色	吴土良	(153)
现代汉语的一些同义语法形式	黄岳洲	(162)
现代汉语言语类型及其修辞功能	胡壮麟	(173)
句子的功能分析和超句研究	王德春	(184)
《曹禺戏剧的语言艺术》序言	张寿康	(209)
从《小木屋》看黄宗英作品的修辞特色	徐丹晖	(213)
论李逵语言的特点	陈 坚	(222)
谈巴金《家》的比拟	步梅新 刘铁岩	(237)
语格概说	郑颐寿	(248)
辞格组合体系试探	李晋荃	(259)
谈一种新辞格——强连	高继平	(272)
论语言的歧义辞格	马晓云	(279)
“多线顶真”论	夏扬标	(295)
本世纪汉语语体理论发展简论	宗廷虎 李金苓	(307)

短论二题

吕叔湘

一、谈谈文章学•

今天文章学讨论会开幕，寿康同志要我说几句话，我很为难。尽管我写了几十年的文章，始终是暗中摸索，要我说道理可说不出多少。

文章学研究什么？能不能说就是研究好文章为什么好，坏文章为什么坏？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写成书，供学着写文章的人参考。这就必须防止一种误会，别以为看了这些文章、这些书，就准能写出好文章。五十年代，学习语法曾经风靡一时。后来很多人失望，说是学了语法之后仍然免不了语句不通。会不会有人读了文章学概论之类的书仍然写不出好文章，因而埋怨作者？我看很可能。这都是因为他们没闹清楚知识和技能的关系，不知道要把知识化成技能要经过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改正的过程。孟子说的“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大家在这里聚会，讨论文章学，我却说到拿文章学

•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师院于1986年1月举行的“文章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题目是编者加的。

数人上去了，不免有点儿离题，请原谅。

二、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我在一本书里头，偶然看见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国的画家，叫德卡，是一个印象派画家。这位画家，除画画之外，还喜欢作两首诗，对于作诗也很热心。有一天，他作诗，那个诗老是不出来，他去找他的朋友，一个诗人，叫马拉梅，他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德卡跟他说：“我呀，一肚子的诗，写不出来，是个什么问题？我有很多诗的思想，不能把它写出来。”马拉梅就对他说：“老兄呀，诗这个东西，是拿语言把它写出来的，用文字把它写出来的，不是用思想写出来的，思想没法子写，要写就得用语言。”

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引起我一些感想。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诗人懂，散文作家也懂，现代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懂，有的就不太懂。现在的文艺评论都是强调生活，说一个作家要有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东西，这话很对。但是光有生活够不够呢？你把生活经验转化成为文学作品，你要通过一种媒介，就等于我们吃东西进去，要有一种酶帮助消化。把生活转变成作品要通过语言，这个道理，我们的作家，至少是大部分作家，是懂的，因为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光一肚子生活，没法子把它变成作品，这就跟德卡问马拉梅问题一样。怎么办？马拉梅说你得用语言把它写出来。这个道理就跟一个画家画油画一样，你首先得调色，这个颜色，这个色

-
- 本文是作者在“语文研究新成果系列讲座”（1985）开幕式上的讲话。题目是编者加的。

影，你得会调，然后才能画。你不借助于颜色，没法子画出来。我们作家，大部分都懂这个道理，因为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非常遗憾，我们的好些文艺评论家，像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开口生活，闭口意识形态，却不讲语言。这种文艺批评是片面的。我们的文艺批评家是这样讲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就跟着这样讲，也是在那儿讲生活，讲意识形态，很少讲语言。那样讲文学，我认为是片面的，讲不好的。

因为有了这个感想，我就去查查书。我查了两本文学史，一本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本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我看这两本书讲杜甫是怎么讲的。当然都讲到杜甫的思想等等，这是两本书共同的。我就看这两本里头讲杜甫运用语言是怎样讲的。刘大杰的书上讲的不多，讲的是杜甫入蜀以后，他的作品就有一种“道遥恬静的风格”，就那么很笼统的几句，好像杜甫运用语言的能事就那么一点，没多少可以说的。文学研究所讲杜甫，有专门一节讲“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这里头讲的就比较多。说他是：“精工锤炼，卓然成章。”又说：“他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沉郁’”，“或雄浑、或悲壮、或奔放、或瑰丽、或质朴、或古简、或轻灵，无不达于胜境”，就是说他各种风格都有。还有一个地方说：“杜甫的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点出他用字，举了几个例子：“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个“垂”字，一个“涌”字都用得好，“群山万壑赴荆门”，“赴”字用得好。另外一个地方说他“还善于运用民间口头语言和方言俚谚”，另外一个地方，说“他卓越地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声韵”，“他的诗

不仅具有形象的美，而且具有音乐的美”，如《石壕吏》这一首诗，内容有转变的地方，诗的韵脚也换了，换韵是配合它的内容的。总的说来，文学研究所讲杜甫运用语言比较多一点。

我又查查从前人的诗话。这种书我手头不多，就有一部《苕溪渔隐丛话》。这部书分前集后集，杜甫在前集有九卷，后集有四卷，共十三卷。我就拿他跟别的作家比较，韩愈是三卷加一卷，共四卷；欧阳修两卷加一卷，三卷；王安石四卷加半卷，四卷半；苏轼九卷加五卷，十四卷；黄山谷三卷加两卷，五卷。杜甫跟苏轼他们两位，讲的特别多，引的材料特别多，讲他们这首诗那首诗，讲他们作品比较详细。我意思是说，我们古人讲文艺作品，很重视作家怎么运用语言，有些什么特色，举了很多例子。而我们现在讲文艺，这方面非常忽略，光讲内容，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很明显。我希望这个讲习班上讲文学的同志——当然有分工，有的题目就是说明讲思想的，那当然讲思想了，是不是也有的可以多讲一点作家怎么运用语言。就是讲思想，他的思想也不能赤裸裸地往作品里头搁呀，他还得给它穿上衣服呀，那就是语言了，他得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总之还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今天就这么个意思：咱们的题目是讲语言的固然要讲语言，题目是讲文学的也讲讲文学作品怎么运用语言来表达内容。我就提供这么一个建议。

张志公和现代汉语修辞学

黄成雄

张志公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法学家和语文教育学家，也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修辞学家。他自50年代初期步入修辞学研究领域，30多年来，他对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卓有成绩，在丰富修辞学理论，推动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和普及等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受到修辞学界的推崇。志公先生自50年代以来发表了不少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其中有不同时期出版的专著，有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论文，有关于修辞学问题的讲演，还有为一些修辞学著作所写的序言。这些著述集中反映了志公先生在修辞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透过这些著述，我们可以了解志公先生作为一位修辞学家，他对现代汉语修辞学所作的贡献。

在我国，对修辞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探讨，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但是，这门学问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就已萌芽。《易传》中已提出“修辞”这个名称（《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不少先秦著作中

注：本文是作者为《张志公文集》第二卷（修辞卷）所写的前言。

已谈到一些修辞现象，能从修辞角度把语言分为好言、莠言、巧言等，对夸张、比喻等修辞技法作了很好的解释。但是，从先秦到两汉，还没有专门谈修辞的著作产生。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谈论修辞的著作渐渐多起来。三国时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风格问题，西晋陆机的《文赋》谈到声律、语句安排和文章风格等问题。南朝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承前启后，在我国修辞学的建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对此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南宋陈骙的《文则》，金人王若虚的《滹南遗志集》，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以及宋以后的一些诗话、词话、曲话等，从不同的方面充实了《文心》勾勒出的汉语修辞学的蓝图，对汉语修辞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修辞学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在此前后，还出版了别的一些修辞学专著，如张弓的《中国修辞学》（1925），唐钺的《修辞格》（1929），陈介白的《修辞学》（1930），王易的《修辞学通论》（1933），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1933）等等。这个新阶段的特点，主要在于引进了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系统，与我国传统修辞学观念结合起来，开始对汉语修辞学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朝着建立符合汉语汉文实际的修辞学体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修辞学发凡》正是这个重要发展的代表作，对汉语修辞学的现代化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修辞学发凡》问世之后，中国修辞学的研究与汉语语法学的研究，以至与语音学和方言学的研究比较而言，趋于沉寂，冷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修辞学研究才有了新的转机。

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书的刊行，对修辞学起了革新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把修辞和语法结合起来，重在应用，只讲白话文，这两点都和以往的修辞学不同。这本书侧重于匡谬正误，主要举语言运用中有语法和修辞错误的例子，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指出改正的方法，这与《文则》和《滹南遗志集》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与《发凡》建立起来的“消极修辞”，不无渊源关系。既吸取《语法修辞讲话》的特点，又从正面讲修辞的著作，则推张志公先生的《修辞概要》。

《修辞概要》是1951年开始以“张环一”的笔名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分期发表的《谈修辞》的结集，于195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2年经过修订，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改用张志公本名，并在书名下附加小标题“读写一助”。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著作，它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是一部纯粹的现代白话修辞学著作，把研究对象限于现代口语和现代白话作品中的修辞现象，不涉及文言修辞。这与二三十年代的修辞学著作主要举文言为例证或专门援用外国文的全部修辞格的讲法完全不同，与《修辞学发凡》兼顾文言和白话也不一样。

第二，它把修辞和语法结合起来，讲用词、造句中的修辞问题。在用词问题上，讲到一些新词的正确意义和正确用法；在造句问题上，讲了造句的一些基本问题，讲了长句、短句的运用，讲了语序和语气问题等等，这样既讲了语法，又讲了修辞。

第三，它打破了修辞学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限，扩大了修

辞学的范围，一头连接上语言特点，讲用词造句，另一头延伸到篇章结构和文体风格。这种做法在30年代曾经有人尝试过，影响很微弱。陈望道先生提倡这样做，他在《修辞学发凡》中谈到文体风格问题，也还比较简单。《修辞概要》对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的修辞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论述得更加明确，内容大大丰富了。在这一点上，《修辞概要》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第四，它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着眼于实用，把修辞学的道理谈得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对在群众中普及修辞学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对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志公先生是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建立了中国修辞学的第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从而成为标志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志公先生的《修辞概要》和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一样，则是紧步《发凡》之后，对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创立起了奠基作用，它的影响所及，是很深很广的。此后出版的各种修辞学专著和修辞学教科书，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修辞概要》的影响，特别是结合语法讲修辞和把修辞学的研究扩展到篇章、文体文风这两点，后来为修辞学界相当普遍的接受了。

二

自《修辞概要》问世以来的30多年间，志公先生在修辞学领域中辛勤耕耘，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我认为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对修辞的本质特点作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给修辞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精确的定义。

修辞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并有不少谈论修辞的著述。但究竟什么是修辞，还没有既简明扼要又比较全面准确的一个界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修辞学专著，开始触及这个问题，说法不一。最简单的说法是：语法讨论对不对的问题，修辞讨论好不好问题。陈望道先生曾作过这样的归纳：对“修辞”的解说，“大体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运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运用语辞。”（《修辞学发凡》）陈先生是赞同对修辞的广义解释的，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传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修辞学发凡》）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解释，都把语辞作为修辞的主要对象。此外，还有别的一些说法。

在这个问题上，志公先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他提出“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他又提出修辞就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这样一个观点，认为“讲修辞，就是讲运用语言的艺术，并不是说在运用语言中加点花巧。”（《汉语修辞概说》）所谓运用语言的艺术，是指“在应用语言（包括它的书面形式文字）进行日常交际或各种书面写作的过程中，利用这种语言提供的各种可能的手段（语音的、语汇的、句法的、篇章结构的），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汉语修辞和汉语修辞学》）而最好的表达效果应该是“用最经济的语言材料，

传递最大的信息量，达到最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修辞和修辞教学》序）什么是修辞的最高标准呢？志公先生提出，“效能最高的语言是规范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而不是二者相加。”（《汉语修辞概说》）他是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语言的规范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的。规范性是艺术性的基础，违反了规范性，语言不正确，就谈不上艺术性；缺乏艺术性，语言贫乏干枯，即使合乎规范，也是苍白无力，效能不高的。规范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看法，比把二者截然分开，以规范性为较低层次，而以艺术性为较高层次显然是有所发展，更为科学一些的。

第二，明确提出修辞的三性——民族性、社会性、时代性。

修辞具有民族性、社会性和时代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以往的修辞学著作一般都不讲这个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修辞看作一种超时空制约的单纯技术。志公先生注意到这个问题，把它明确的提出来了。他指出，“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艺术讲美。美学观点是有民族性的，修辞也必然有民族性。”（《汉语修辞概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美学观点和审美情趣，这是与它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地域的自然条件等分不开的。志公先生以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为例，讲到中国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塑、书法等，语言艺术也不例外）都讲究虚实，讲“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这种审美观是我国传统哲学的虚实观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此外，还有以整齐对称为主、参差错落为辅的审美观，以及擅长用比，大量用比所反映的含蓄、幽默、内向的心理性格特征，等等，都是带有民族特色的。